

## 话语政治

## 话语政治的分析框架及其意义\*

唐青叶

摘 要：本文强调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要素，并基于一定的政治话语语料，构建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媒体政治话语分析框架。其意义在于通过对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权力与意识形态的多维分析，透视话语的建构和社会实践功能，从而揭示话语选择背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动因，为认识和解构西方媒体政治话语体系、提升中国国家话语能力和国家形象提供某些启示。

关键词：话语政治；语言符号；非语言符号；意识形态；权力

作者简介：唐青叶，博士，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及上海大学全球学研究中心教授（上海200444）。

文章编号：1673-5161(2013)03-0094-13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得到“上海大学085优青项目”的资助。

## 一、引言

近年来从语言角度探讨世界政治、国际安全和国家对外政策的论述明显增多，国际关系研究发生了语言转向，语言的本体作用以及语言对国际关系的建构作用得到重视。国际关系研究对语言和各国话语体系的关注突显了语言或话语的本质特征，即话语不仅表征现实，而且建构、折射社会现实，是一种社会实践形式，人通过话语赋予权力，并赢得话语权。政治话语构成了一个国家外

---

孙吉胜：《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载《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70-84页。

交和处理国际关系的舆论工具，政治和媒体关系密切，媒体的“政治需要学”也就是指媒体的生存之道，让社会需要它，让政府也离不开它，政治话语作为社会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语类（genre）。本文把政治话语界定为由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政党、政治家、政治社团或机构）发起的与政治活动相关的各种语类，如政治演讲、政治访谈、政党宣言、政治辩论、社论、外交评论、政府新闻发布会、政府各部门颁布的政策法规或文件、政治广告、政治脱口秀节目、政治新闻报道等，这些话语活动在国家进程中有明确的目的和功能，政治语言研究紧紧围绕政治活动展开。本文以政治话语为例，尝试从语言和非语言符号两个层面构建政治话语的批评性社会符号学分析框架，力求有效揭示话语的施事力量，以及政治活动的参与者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自己的目的，旨在为加强我国国家话语建设和提升国家话语权建言。

## 二、作为识解经验和表征现实资源的语言符号

系统功能语言学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其理论如系统思想、语境、语域、语类、批评话语分析、多模态视角等可为政治话语分析和国际关系研究提供工具性的指导。系统功能学者马丁、王振华区分了语言三个层次：体现化、实例化和个性化，是语言表征经验现实的语义网络。在这三种层次关系中，语言系统的低一级层次体现高一级层次，音系、词汇语法和语篇语义各层次之间是体现关系，语篇是从抽象语言系统中所做选择的实例化，同时又是识解主体生成实例语篇时观点、态度的个性化。这种层次观充分揭示了经验识解、符号系统和识解主体之间的关系：经验识解的主体是概念化的人，是个体通过选择来识解情景并为了达到交际目的而做出的表述，这一视角体现了意义是社会的、主体间性的过程。个体人在文化系统中互动，互动时选择意义的编码取向，选择自己圈子和个体。这种语言层次观强调了个性化对经验识解和语篇生成的影响，体现了语篇的主观性，即不同的人对具有同一性的客观世界并把它赋形于语言符号时便按照其自身的异质性（heterology）原则选择、组合，最终生成语

---

张国庆：《话语权——美国为什么总是赢得主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澳]J. R. 马丁、王振华：《实现化、实例化和个性化——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三种层次关系》，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73-81页。

篇，每一个具体实例是识解者个性化的建构。

### 1. 句法语义层

由于媒体的话语权被主流文化和主流媒体所掌控，在国际政治话语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往往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些弱势国家处于“被言说”、“被表征”的境况。人们通过对词汇语法层面的及物性分析发现，表征这类参与者角色的词汇常常居于隐性的位置而被抽象化。正如福勒（Fowler）所说，第三世界的穷人当做及物性动词的宾语，那就必然给读/听者留下这样的印象：穷人是被动的牺牲品，而不是斗争的参与者。

韩礼德（Halliday）认为“选择就是意义”。词汇语法系统的选择不是任意的，用什么样的词来表征其言说对象都有一定的理据。对于同一个客观事物，不同的语言表达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并演绎出不同的游戏规则和行事逻辑。而每一个不同的命名或称呼背后都有一整套理念和价值观念，表征着一套不同的关于被表征者的话语系统，命名不仅简单地为某个事件或现象提供标签，也建构了随后的规则和行为，如美国政府把伊拉克战争称为“解放”，而伊拉克人则称这场战争为“入侵”；对本·拉登也有“恐怖分子”和“自由斗士”的不同标签。“9·11”事件一开始被称作是两大文明的冲突，即“西方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但后来改为“恐怖袭击”。这种命名的变化对于认定袭击的性质和美国政府随后采取的行动非常重要。“文明冲突”的命名有可能建构出整个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对抗，而称为“恐怖袭击”不但可以避免出现两种文明的对立，还可以为政府采取的各种行动提供正当理由，使战争得以合法化。

针对当前世界面临的环境问题，选用什么样的语言就存在争议，如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一直使用“气候危机”（climate crisis），前总统乔治·W·布什在其国情咨文中用“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还有一个类似的表达是“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在欧洲人们常用“气候混乱”（climate chaos）。相比之下，“气候危机”和“气候混乱”明显强化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必须采取措施应对的紧迫感，而“气候变化”给人的感觉是该问题可控且对人类不至于形成太大的挑战，“全球变暖”则更容易把公众的注意力框定在全球平均气温上，而不去关注更为严重的诸如海啸、水灾及早灾等环境问题。布什政府最后还是选用了比较稳

---

R. Fowler,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1991.

M. A. K. Halliday,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孙吉胜：《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研究——以语言游戏为例》，第41页。

妥的表达，即“气候变化”。

隐喻也是命名过程的另一种形式。概念隐喻在塑造政治生活和政治话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隐喻考量政治话语为理解当代国际政治话语提供了新视角。隐喻作为一种修辞格与政治话语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和西塞罗的《论演说术》中得到了强调；拉科夫（Lakoff）和约翰森（Johnson）指出，隐喻是人类思维和生存的方式；拉科夫的政治研究是其语言和认知研究的延伸，人们的政治思维依赖于框架、原型、隐喻、意象等语言和认知手段，对语言的控制就是对思维的控制，媒体借此对思想进行操控。查特里-布莱克（Charteris-Black）也提出隐喻是对政治问题进行概念化和构建世界观的一种重要手段；哈尔斯（Hulsse）分析了隐喻对国家形象的影响，她基于1975~2008年的英语和德语报刊关于列支敦士登的报道，从隐喻角度反映了该国的媒体形象突变，从“金融避风港”、“金融绿洲”和“乐园”，到“阴暗的税收避难地”、“肮脏的洗钱绿洲”、“骗子、罪犯和恐怖分子的乐园”，再到重塑新形象的“王冠”、“宝石”和“品牌”隐喻。麦克菲尔（MacPhail）分析了禽流感（即H5N1病毒）蔓延时世界媒体如何用这一瘟疫来比喻政治。禽流感本是一种疾病的名称，因为1996年首次在中国的家禽身上分离出而被称为“中国流感”，进而作为一种政治延伸达到影射中国的目的，揭示了隐喻性政治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

## 2. 语用层

模糊策略即语用含糊，指言语交际的不确定性和笼统性，是一种理据性很强的语言选择，是外交活动的一种重要语用策略，外交表态经常要刻意笼统，如古代威尼斯使节的训令说：“使节应该用对任何事都不承担责任的一般性词句来表达一切。”在涉及非常敏感的话题时，外交家们要么避重就轻、环顾左右而言他，要么转移话题、巧换概念、分散注意力，甚至让听者上当等，这些都是语用含糊的表现。这种策略有助于控制、掩饰、操纵话语，避免意见趋异

---

孙吉胜：《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语言研究：回顾与展望》，第70-84页。

G. Lakoff,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G. Lakoff, *The Political Mind*, New York: Penguin, 2009.

J. Charteris-Black, *Corpus Approaches to Critical Metaphor Analysis*, Basingstoke: Palgrave-Macmillan, 2004, pp.47-48.

杨敏：《2009年度〈语言与政治〉述评》，载《外国语》，2010年第5期，第91-95页，R. Hulsse, “From Paradise to Brand,”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No. 1, 2009, pp.112-135.

T. MacPhail, “The Politics of Bird Flu,”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No. 3, 2009, pp. 456-475.

魏在江：《从外交语言看语用含糊》，载《外语学刊》，2006年第2期，第45-51页。

的隐含信息，是一种话语策略和权力表达的协商。

在国际关系领域，新闻记者或政客们巧妙地运用那些意义非常笼统、语境依赖性极强的名词，如 position、situation、thing、condition、claim、idea、observation、problem、question 等来传达自己的态度和观念，高威尔斯(Gowers)指出，政客们偏爱 position 与 situation，以此抑制了某些有潜在危险的信息，策略性地有意掩盖了自己不便明说的内容：

(1) Unsheeted lorries from Middlebarrow Quarry were still causing problems by shedding stone on their journey through Warton village, members of the parish council heard at their September meeting.

The council's observations have been sent to the quarry management and members are hoping to see an improvement.

(2) If Iraq fails to comply, then it will face serious consequences.

在语篇(1)的语境下，observations(评论)实指 complaints(抱怨)，而记者有意抑制了语篇的这一真实信息，意在避免卷入该事件中。语段(2)是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调查的决议中的一句话，该句中 serious consequences 的所指非常含糊，可有 condemnation(谴责)、sanction(制裁)或 military action(军事行为)等多种阐释，正是政治话语的这种特征既为以后的行动取得了合法性，又有了灵活变通的余地。

政治活动中各国政界人物的话语不乏这类模糊表达，如(3)(4)：

(3) The U.S. seems only moderately embarrassed at being “the biggest Piker in the U.N.” (Bill Clinton's words), because it hopes that withholding \$1.2 billion in dues will force the U.N. to overhaul itself at last. America's allies find that idea dangerous, even stupid. British Foreign Secretary Malcolm Rifkind has chastised the U.S. for wanting “representation without taxation,” a sound bite the British waited 200 years to use.

---

E. Gowers, *Plain Words: Their ABC*. London: HMSO, 1957.

来自米德尔巴勒采石场的裸露货车在过往华腾村庄的路途散落石子，仍然产生许多问题，教区议会成员在九月召开的会议上听说了。

议会的评论已转达给采石场的管理部门，议会成员希望事情有所好转。(Quarry load-shedding Problem, *Lancaster Guardian*, Sept. 12, 1986.)

如果伊拉克不服从，它将面临严重的后果。(Rachel S. Taylor, *World Press Review* <http://www.worldpress.org/specials/iraq/>.)

美国似乎对“联合国里最大吝啬鬼”(比尔·克林顿语)只感到相当尴尬，因为它希望拒付12亿的债款将迫使联合国最终自行解体。美国的盟友认为这种想法很危险，甚至愚蠢。英国外交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严厉申斥美国“既要代表权又不纳税”的行为，这是英国

Even Madeleize Albright, the U.S. ambassador to the U.N. admitted to Newsweek that “the problem of the money has lowered the effectiveness of our message.” No one is sure what *the message* is.

(4)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Hillary Clinton admitted on the 7th that China play an important leadership role in many areas, but she also called on China 'concrete way' to prove its rise, global network reporter Guo Wenjing reports, meet the world's interests, adding that China needs to take greater responsibility.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emerging national security and stability brought about by the historical challenges, they do need to perform special duties, in a concrete manner to show that they pursue a constructive way,” Hillary said

例(3)中,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Albright)所用的 message 一词,其蕴涵的真实信息确实让人琢磨。在(4)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承认中国在许多领域扮演重要领导者角色,但她同时呼吁中国以 concrete way(具体方式)、constructive way(建设性的方法)证明其崛起符合世界利益,并称中国需要承担 special duty(特殊的责任),这些含糊词汇一方面彰显了强势国家的霸气,另一方面达到了特定外交语境下故意不明说的意图。

人称代词介入社会生活构成政治话语研究的又一个重要课题。在政治话语中,人称代词的使用不是任意的,具有强烈的语用理据,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听到卡扎菲死亡的消息时说:“We came, we saw, he died.”(我们来过,我们看过,他死了。),这一话语巧妙地仿拟了恺撒(公元前100-公元前44)的名言“Veni, Vidi, Vici”(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我来过,我看过,我征服了。)凯撒大帝名言用第一人称代词单数I(我),而希拉里·克林顿用的是第一人称代词复数we(我们),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治世原则。恺撒名言中三个小句的主语都是第一人称单数,指代自己,暗示战争的胜利是个人行为、个人功绩,揭示了其自负的个性,透露出了一种不可一世的骄态和

---

人等了200年才等到的挖苦的机会。

甚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也向《新闻周刊》承认说“钱的问题已经降低了我们信息的效力。”没有人清楚这个“信息”指的是什么。(“Midlife Crisis”, *Newsweek*, October 30, 1995.)

据环球记者郭文静报道,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7日承认中国在许多地方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但她也呼吁中国用“具体方式”证明其崛起符合世界利益,并补充说,中国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考虑由于历史挑战带来的国家安全和稳定问题,他们确实需要履行特殊的责任,用具体的方式表明他们在寻求一种建设性的方法。”希拉里说。( *Agency France Press* March 8, 2010.)

*Time*, November 7, 2011.

个人英雄主义气概，凯撒大帝独裁和硬实力的治理模式可见一斑。相比之下，希拉里这句话映射的不是个人的野心，前两个小句的主语是第一人称复数，非个人行为和个人权威，而是包含说话人和其他人，更多的是代表组织、机构、政府或国家，指涉的是国家的权力和权威：在美国巧实力方面，指的是美国政府及其他各种力量，缩短了她与听者（或参战国）的心理距离，顺应了其权势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恺撒用第一人称单数统摄全句，语气虽然霸气，但意蕴上整齐统一，和谐平衡。而希拉里用we和he来表征参与者，人称代词we作为权势方与he作为弱勢的“他者”凸显了“我们”与“他/他们”的对立，“我们”的对手、敌人出现在“我们”的视野，所以呈现的是一个分裂的世界，对抗冲突的世界，让我们看到了东西方的冲突，两种价值观的对抗，把我们置于一个异化的话语世界，不和谐、冰冷的世界，也体现了西方两极思维模式。

### 三、作为识解经验和表征现实资源的非语言符号

语言系统是经验识解和表意的资源，而语言以外的其他符号系统如图像、动作、音乐、身势语等也是意义的源泉，也具有系统性。随着新信息技术和电子媒介的出现，非语言符号系统和语言一样是人类识解经验的巨大动力库，是经验转化为意义的物质基础和重要资源，二者作为抽象的潜势为实际言语交际和经验表征提供工具，具有互补性。许多外交和国际重大事件的报道往往是语言文字、图像和图表的复合话语——多模态话语。有些政治话语，如政治演讲、新闻发布会等交际行为中，政治人物要直面媒体和公众，是一种仪式化话语，那些非言语因素，如图像、声音、手势、眼神、姿势、服饰、发型等都有着重要的表意功能。所以有必要关注各种符号模态协同作用下所构建的意义。特别是图像作为一种社会符号，更逼近我们所见的现实世界，图像和语言一样不仅表征物质现实，也构建社会现实的人际互动，巴特（Barthes）认为：新闻图片根据职业、美学或意识形态的准则而被选择、建构和处理。新闻图片的选用都有限制，哪些可以报道，哪些不可以报道有严格规定，如海湾战争中，美国国内播放的图像正是经过合理化处理过的现实，以致人们认为这就是伊拉克战争

---

朱永生：《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载《外语学刊》，2007年第5期，第82-86页。

G. Kress & T.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1996.

R. Barthes, *Image, Music, Text* (translated by S. Heath). New York: Hill & Wang, 1977.

的真实情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攻打伊拉克的目的。作者或说话人的态度或意识形态不仅体现在语言中,也体现在非言语符号模态中,图像的修辞不容忽视,它能够增强新闻的真实感和报道的客观性,但有时通过视觉话语的言说,会夸张所言物,掩盖未言说物,在内容上制造话语暴力,如2008年3月14日,国外有关拉萨骚乱报道。美国CNN网站上发布了一幅拉萨街头“两辆军车向两名平民驶来”的图片,实际上,这张图片经过了剪裁,完整的图片中,军车旁有约10人向军车投掷石块。英国BBC网站、德国《柏林晨报》网站也有关于拉萨骚乱图文不符的严重失误。受新闻媒体的政治立场等因素的影响,新闻图片隐含着报道者对新闻事件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所以图像作为社会符号学的一种,同样是一个选择系统,选择什么图像以及图像包括什么,不包括什么,都是选择的结果,而这些选择体现其意义潜势,在不同的情景语境下实现一定的社会功能,即权力被语言建构并被精密地编织进图像中。非言语符号,尤其是图像,意义含蓄朦胧,在视觉语篇中会置于最神秘、最难以察觉的地方。

#### 四、整合的语言学分析模式——权力运作下的意义建构

根据以上对语言和非言语符号层面的概述,我们建构了话语政治的分析框架,这个框架自下而上(bottom-up)由五个层面组成:一、符号媒介层:语言和非语言的;二、形式层:词汇语法系统、视觉语法系统、听觉语法系统等;三、意义层: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语篇意义;四、语境层:话语范围、话语基调和话语方式;五、意识形态层。具体阐释如下:

一、符号媒介层。符号媒介层指符号的物质形式,即语言与非语言的,前者指语言的体现形式,如文字、声音以及伴语言,如字体、编排;后者指身体语言以及交际时所借助的物质工具。

二、形式层。形式层指生产意义的语言模态中的词汇语法系统以及非语言模态系统。

三、意义层。各种符号资源在话语中所生产的意义,即韩礼德(Halliday)的三大元功能:概念功能(ideational function)、人际功能(interpersonal function)和语篇功能(textual function)。其中概念功能是语言对人们各种经验(外部和

---

党西民:《视觉文化的权力运作》,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页。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内心) 的表征, 由及物性系统体现, 人际功能表达说话者身份、判断、态度、动机和对事物的判断、评价, 包括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基调系统, 语篇功能指把语言成分组织成篇, 包括主位系统、信息系统和衔接系统。而非语言模态意义表征的语法模式指克莱斯 (Kress) 和凡·莱文 (van Leeuwen) 的视觉语法, 他们从再现意义(representational meaning)、互动意义(interactive meaning)和构图意义(compositional meaning)三个方面来分析图像。

四、语境层。韩礼德 (Halliday) 把语境变量抽象为三种: 话语范围(field of discourse)、话语基调(tenor of discourse)和话语方式(mode of discourse)。其中参与者的非言语活动以及相关事物就是交际中的非语言符号资源。在这三个语境变量中, 话语方式指交际实现的媒介, 即口头或书面的, 也涉及符号模态的交际价值。语境是多种符号意义生成的环境, 其本身也是一个社会符号系统, 但我们在做话语分析时忽视了语境的非语言符号构建功能。和单模态语篇一样, 多模态语篇涉及诸如图像、声音、色彩、排版和构图等多种表义方式, 也是人们根据语境所做的有意义的选择, 是意义潜势的实例化, 其内部不同符号系统相互作用, 互为语境, 它们的共同协作更好地表现语篇生产者和交际事件的意图。

五、意识形态层。意识形态层统摄其他四个层面, 制约和影响着其他层面意义的生成。语言、图像以及其他符号系统都具有意识形态功能, 是人类认识世界的特定视角。它们对现实的表征是中介的, 以人的认知为中介。认知的中介本质决定了意义的表征并非中立, 是人类认知的结果。如同语言研究关注谁在说、谁不在谁、如何说、说什么、不说什么、为什么不那样说, 图像时代的话语研究关注的是谁在看、如何看、用什么模态、不用什么模态, 体现了模态与认知、权力的关联性。由于传统的纯语言符号研究对解释社会问题有其局限性, 社会符号学理论旨在描述和解释语言符号和其他符号系统的意义生成、传播和接受的过程, 发现、解释和解决社会实践中的问题。

巴特 (Barthes) 把符号看做一种社会文化意识形态, 把符号学的研究扩展到整个社会。艾柯 (Eco) 指出, 所谓符号, 就是用它来说谎, 既然说谎, 就得使符号的表现面与内容面之间的关系代码化, 这是个习惯。唯有如此, 符号的世界才能成立, 不为与现实世界的指示关系所限定的符号功能也才能发挥。反过来, 正因为如此, 所以才说谎。基于符号的这一本质特征, 符号使用者才有可利用的多种符号资源和多种选择潜势。克莱斯 (Kress) 和凡·莱文 (van

---

[日]筱条资明著, 徐明岳、俞宜国译, 《埃柯: 符号的时空》,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 版, 第 188 页。

Leeuwen) 认为,语言和其他符号资源共同生产意义,并指出任何视觉图像都不是自然与中性的,而是属于意识形态范围。构建现实世界的各种图像,与那些生成、传播和阅读这些图像的社会机构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表达意识形态方面,视觉结构绝不只是形式的,它在语义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奇尔顿(Chilton)和沙夫纳(Schaffner)在强调语言如何体现政治功能时提出,在政治与话语之间设置四个策略功能:1)强迫;2)抵制、反对、抗议;3)掩饰;4)合法化与非法化。因此,意识形态不仅通过词汇语法选择得以体现,也可以通过非语言模态来体现,语言和非语言模态能够使得许多政治行为合法化,从而影响读者或听众以实施操控。基于此,我们需要对政治话语进行批判性研究。批评话语分析方法包括三个维度:1)语篇(text);2)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3)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并从三个方面做进一步研究:一是描写(describe)语篇的形式、结构特征;二是阐释(interpret)语篇与生成、传播和接受它的交际过程之间的关系;三是解释(explain)该过程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关系,揭露话语中隐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所有人类活动都涉及选择,选择就是意义,符号活动也是选择的产品和结果。各种语言和图像要素的选择背后有权力的运作,隐藏着权力的魅影,话语一经产生就立刻受到若干权力形式的操控、筛选、组织和再分配,权力在话语过程中运作,在某种条件下,话语本身常常转化为权力,与此同时,话语又是权力所争夺的对象,是人们表达和争得自己利益的手段。话语权归根结底是对话语本身的掌控,它反映了一个人或国家在社会不同政治、经济地位,强势阶层通过掌握各种各样的话语形式和手段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无权力的弱势者的言语行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并不断宣扬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从而强迫弱势者为其利益和意识形态服务,用自己的话语体系为主流话语行为来实施操控,其中包括概念、逻辑、社会基础以及有利于自己的话题框架。这种权力无处不在,一个音调、一个代词、一个标题、一个话题、一个词组、一个隐喻、一种颜色、一个摄像机镜头等话语符号都同社会权力关系中笼统抽象的事物联系在一起。

---

G. Kress & T. van Leeuwen, *Multimodal Discourse: The Modes and Media of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London: Arnold, 2001, p.46.

P.Chilton, & C.Schaffner, "Discourse and Politics", pp.212-213.

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London: Longman, 1995.

[法]福柯著,谢强、马月译,《知识考古学》,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

毛浩然、徐赳赳:《话语、权力与操纵——<话语与权力>评述》,载《外国语》,2009年第5期,第91-95页。

话语和权力的关系在国际关系的实际运作受到话语主体本身因素的影响。不同主体的施动能力不同,与其实力、地位和角色有关,从而导致其话语力及建构效果有别,强势方会按照自己的利益诉求制定规则,弱势方只能被动地接受与遵守。一个国家如要获得真正的话语权,实力毋庸置疑,其话语体系必须能够直接再现自己的经验、思想和现实,如布什总统将“9·11”袭击定义为袭击美国的战争行为,体现了依据其强势地位来设定话题和话题框架,直接框定主题,从而建立了一种关于战争的政治语境,使后来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合法化,为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构建了概念框架。又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把中国在非洲的行为命名为“新殖民主义”(new colonialism),并提醒非洲国家警惕中国的这种行为,这种话语行为显然有其作为强国的政治动机,美国借助其强势话语权用殖民主义的概念框架和话语来解释中国的行为,却把自己在非洲国家,如在赞比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说成是帮助他国的另一途径。在这种话语空间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异己”的世界,即“我们”与“他者”的对立。再如希拉里在2011年11月30日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后,再次暗示中国对非洲国家援助的目的是着眼于受援国的自然资源,也同样呈现出殖民主义的话语思维。

语言从来都是帝国的最佳伴侣。国际话语(包括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话语)是通过为国际事务命名和提供意义解释而产生并流通的,如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中的关键词——民主、自由、恐怖主义、全球化等话语。命名权和解释权就是一种霸权,它规定着接受方的行动,影响着公众的社会认知和价值判断。西方的“普世价值”成为其力量合法性的依据,西方国家用自己的认知图式、符号系统所构建的中国形象不是对中国现实的真正反映。话语权背后体现的是强者对弱者的权力支配关系,越是弱势者越要争取成为话语构建与流通的积极参与者,积极投身于事关意义(即利益)的国际流行的通用表述,因为在国际话语流通中获得发言权并发出响亮的声音,是扭转劣势的主要途径之一。国家形象的传播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传播,也是语言的传播,任何国家行为都需要语言来叙述,在国家形象的符号化过程中,我们需要知道世界如何想象中国,并及时有效地告诉世界中国是什么样的,如果失语,中国的话语和行为就会常常被误读。王逸舟在《创造性介入:中国的外交新取向》中

---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12-4.html>.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版。

胡春阳:《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途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

胡范铸、薛笙:《作为修辞问题的国家形象传播》,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6

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提出塑造“于我有利、多数认可”的国际规则和话语观念。中国要拿出更多方案并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和援助，以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有中国的印记、操作及贡献，从而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与话语权。从这一目标看，国家的话语修辞以及话语建设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如何依靠语言行为提高国家行为的有效性，如何深入语言文化及其表征，为国家形象、国家安全等问题提供建言也是语言学者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 五、该分析框架的意义

本文构建的媒体政治话语分析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理论上，本分析框架从微观的话语内容到宏观的话语修辞，从语言形式到视觉图像，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政治话语各层面的特征，为我们分析和解读政治话语提供了理论基础和依据；它也涉及对话语的生产、分配、消费、解释等活动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系统研究，通过文本分析透视话语修辞的权力诉求。实践上，该分析框架关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语言或符号学转向，强调语言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语言层面揭示当代中国如何构建对外政治话语，如何反映和建构国家对外政策，为国家话语建设、媒体话语传播提供决策思路。在国际形象与话语权争夺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用国际社会听得懂的语言把中国的事情、政策和原则说清楚、讲明白，是扎实推进公共和人文外交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需要研究西方话语及其修辞传统，洞察其语言使用的修辞过程，准确把握语言使用者的动机，同时加强国家的语言传播能力和效力研究，生产高质量的话语，摆脱“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话语困扰，让“中国故事”被外国公众所喜爱，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切实构建起一个有利于实现“中国梦”的和谐外部环境。

本文基于国际关系视野建构了一个系统的政治话语的语言学研究路径，以语言和非语言符号分析为手段，全面揭示话语与社会、意识形态的互动以及话语中隐藏的权力关系。从该理论框架可以看出，语言学要素在认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过理解语言表达，力争为改变中国弱势话语局面、完善中国媒体话语应对策略、争取国际话语权以及提升中国形象提供某些参考。

---

期，第 35-40 页。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Discourse Politics and its Significance

**TANG Qingye**

(TANG Qingye, Ph.D,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Center for Global Studies,  
Shanghai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mphasizes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modes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ed on data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t build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media pol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of This framework has its significance in that through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modes, power and ideology, it helps reveal the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of discourse, and the power and ideological motivation behind the choice of discourse. Therefore, it sheds some light on the recogni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discourse system and enhances China discourse 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image.

**Key Words** Discourse Politics; Linguistic Mode; Non-linguistic mode; Ideology; Power

(责任编辑：潜旭明)